

《天方尊大真经中华明文注解》

——中国已知最早 《古兰经》 小经汉语通译本介绍

丁士仁 罗小芳

伊斯兰教于公元7世纪传入中国，随之而来的是伊斯兰的经典《古兰经》。从唐朝到民国的1200多年中，《古兰经》始终没有被完整地翻译成汉语，不为广大中国人了解。目前学术界已知我国最早《古兰经》汉译本出版于民国十六年（1927），是我国汉族学者铁铮从日文转译过来的。然而，笔者在整理伊斯兰文献的过程中惊喜地发现，1912年由两位甘肃籍阿訇用“小经”文字以经堂语翻译了《古兰经》全文，命名为《天方尊大真经中华明文注解》。这一发现刷新了我国《古兰经》翻译的历史纪录，将中国汉语通译《古兰经》的历史提前了近15年。该译本对研究我国经堂教育的发展和经堂语的应用，以及明清时期的汉语言的特点具有重要的意义。另外，中国穆斯林用“小经”字母拼写汉语，是伊斯兰文化中国化或本土化的重大尝试，是对汉文化认可的重要步骤，同时，也是中国穆斯林对汉文化产生向心力的一个标志。

关键词：《古兰经》翻译 小经 经堂语

作者：丁士仁，1966年生，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博士；罗小芳，1987年生，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外国哲学硕士研究生。

伊斯兰教于公元7世纪随阿拉伯穆斯林商人由海道传入中国，在古老的华夏大地牢牢地扎下了它的根基。伴随穆斯林而来的，就是伊斯兰的经典——《古兰经》。《古兰经》是伊斯兰文化的渊源，也是他们思想和行为的指南。一千多年来，中国穆斯林一方面汲取《古兰经》的营养，另一方面饱受中华文明的影响，创造出了融中国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两种血脉为一体的独特的中国伊斯兰文化。它不仅是世界伊斯兰文化的宝贵遗产，也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兰经》是伊斯兰的根本性经典，是伊斯兰的基础。然而，如此重要的经典在中国竟以外文（阿拉伯语原文）的形式流传了一千多年，直到20世纪初才被全部翻译成中文，被广大中国人所了解。

一、《古兰经》汉语翻译版本

自7世纪中叶伊斯兰教传入中国至清末的10多个世纪中，《古兰经》在中国传播较为缓慢，既没有阿拉伯文的印本，也没有汉语译本，仅靠手工抄写和口头翻译，心耳相传。明末清初，一些精通阿拉伯文，同时又具有很高汉文化修养的穆斯林学者如王岱舆、刘智、马注等，开始致力于伊斯兰教典籍的汉文译著活动，向穆斯林圈外的汉族士大夫介绍伊斯兰的教义，并以伊斯兰的内涵改造儒家哲学，借用中国哲学的许多概念阐释伊斯兰的宗教义理，为普通中国人了解伊斯兰搭建桥梁。然而，他们始终没有将《古兰经》的翻译列入他们的工作日程，其主要原因是，这

些学者治学严谨、信仰虔诚，认为《古兰经》是真主的语言，是穆斯林的行为准则，不可误译或曲解，或损毁原文的微言大意，使原意走样失真而引入于迷雾。不过，在他们的著述中，已经出现了《古兰经》零星句子的翻译。清朝末期，逐渐出现了对《古兰经》一些章节的选译。19世纪中叶（约19世纪60年代）出现了马复初的《宝命真经直解》五卷，1899年发行了马联元翻译的《孩提译解》（即《古兰经》节选本）。^①20世纪初，随着我国与世界各国在文化上的交流，国外的《古兰经》译本传入中国。与此同时，我国的新文化运动也在蓬勃发展，伊斯兰文化也随之觉醒，于是，《古兰经》的翻译工作也逐渐拉开了序幕。

民国六七年间（1917—1918年），海全、王文清（王静斋）、沙锦章、李正芳等学者用两年时间完成了一部经堂语《古兰经》译本，只是没有付印。^②民国十六年（1927）十二月，由北平中华印刷局出版发行了我国汉族学者铁铮的汉译本《可兰经》，它是目前学术界已知的最早的《古兰经》汉语通译本。铁铮不懂阿拉伯语，他根据日文的《古兰经》译本，并参照罗德威尔的英译本翻译出了《古兰经》汉语的全译本。^③尽管该译本不是从阿拉伯语原文直接翻译的，但也是中文的第一部通译本，^④故在中国伊斯兰教译经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填补了译经史上的一个空白。1931年在上海出版了姬觉弥主译的《汉译古兰经》，此译本参照了英文和日文的翻译；王静斋阿訇的《古兰经译解》甲、乙、丙3个译本于1932年、1943年和1946年出版发行，这是中国穆斯林译出的第一部中文译本，也是直接从阿拉伯语原文翻译过来的；1943年，刘锦标阿訇的《可兰经汉译附传》于北平出版；1947年，杨敬修阿訇的《古兰经大义》由北平成达师范出版部印行；1981年，马坚教授的全译本《古兰经》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迄今发行量最大、影响面最广的汉文通译本；1988年，林松的《古兰经韵译》出版；1989年，美国华裔穆斯林学者全道章的《古兰经》中阿文对照详注译本由南京译林出版社出版；1996年，马振武阿訇的《经堂语古兰经》问世，这是一部很有特色、受经堂阿訇和满拉（学生）欢迎的译本，因其语言采用的是经堂通用的经堂语；另外，1987年，买买提·赛来的《古兰经》（维吾尔文）出版；1990年哈再孜和马哈什合译的哈萨克文通译本《古兰经》。至今，《古兰经》的各种译本在我国有近20种，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伊斯兰文化的内容。

二、最早《古兰经》汉译本

笔者近期在搜集中国伊斯兰文献的过程中发现了一部流传于西北民间、完成于1912年即清宣统三年（中华民国元年）的《古兰经》汉语通译本。这一发现将中国《古兰经》翻译的历史整整提前了15年。该通译本名叫《天方尊大真经中华明文注解》，^⑤阿拉伯语命名为《汉语注

① 见林松《古兰经在中国》，宁夏人民出版社，银川，2007年，第18页。

② 同上，第55页。

③ 同上，第15—16页。

④ 铁铮的译本是第一部中文翻译，但不是第一部汉语翻译。下面介绍的《天方尊大真经中华明文注解》虽然不是中文，但是汉语。所以，笔者在这里将中文和汉语做了区别。

⑤ 这一名称可能是后来别人取的名字，发行时印在封面，译者只叫《汉语注释》，而且80年代末翻印的版本也没有《天方尊大真经中华明文注解》的名称。

释》，由两位甘肃籍阿訇马福禄和沙忠历时三年共同完成。尽管该译本采用了“小经”文字，^①但它属于汉语的范畴，因而是中国第一部《古兰经》汉语通译本。

(一) 译者简介

马福禄阿訇，经名叫伊卜拉黑默，以“托伊布掌教”著称。据马福禄阿訇后裔马谨老先生介绍，相传其祖上属南京人，后迁到开封，又迁至甘肃洮州（今甘肃临潭）。祖上在临潭生活了很久，马福禄就出生在临潭。据此，马福禄当属甘肃临潭籍人。马福禄从小在洮州念经，娶洮州丁氏女子为妻。他年轻时携家小离开洮州，很可能是在清同治二年至五年洮州回民反清起义时逃离的^②。离开洮州后，他先在临夏三甲集念经，最后来到兰州。在兰州，他家起初住兰州海家滩（今兰大二院），后迁居秀河沿，儿子马元做古玩生意发家后住东关。马福禄阿訇来兰州后先后在秀河沿、桥门和新关清真寺念经，后来一直做新关清真寺的掌教。他于光绪三十年左右，在皋兰山自己的田产修皋兰山座清真寺，自任阿訇兼学懂。马福禄阿訇写一手优美的阿拉伯文书法，经常抄写《古兰经》。据马谨先生介绍，马福禄阿訇一生抄过七部《古兰经》，大多数毁于文革时期，现存两部，一部珍藏于马谨老先生家中，另一部就是现《天方尊大真经中华明文注解》的正文。马福禄阿訇歿于 1924 年（或 1923 年，马谨老先生已记不清）农历十月初十，葬于皋兰山，享年 77 岁。据此，他应生于 1849 年左右。

沙忠阿訇，经名叫奥拜顿拉。据沙忠阿訇后裔沙虎阿訇介绍，他祖上是南京人，明初戍边来到兰州的。据毁于文革时期的沙家族谱记载，沙忠祖先叫沙元昊，是明朝武将，随部队来兰州戍边，之后再没有班师回南京，就住到了兰州。到沙忠阿訇时，他家住在兰州沙滩口（五泉山下侧），后迁至南稍门（现南关）。沙忠阿訇早年在南稍门本坊马世忠阿訇（音译）门下念经，后一直在南稍门清真寺教学，并刻写基础教材，印刷发行。另据介绍，沙忠阿訇曾在兰州和平台清真寺开过一任学。沙忠阿訇也是兰州有名的阿拉伯语书法家，常给人写阿拉伯文牌匾和对联，《天方尊大真经中华明文注解》的小经译文就是他誊写的。他歿于 1932 年农历 8 月 14 日，葬于兰州大沟，享年 84 岁。据此推断，他应生于 1850 年左右。

由于两位都是精通阿拉伯语的阿訇，又是阿拉伯文书法家，而且还是“知己的朋友”，两人经常合作翻译经典。两人的合作成果颇多^③，主要有《伟嘎耶》第一册，穆斯林常识读本《番苏里》、《穆很麻特》、《奥穆代》、《奈扎特》，阿拉伯词法和语法《阿语词法》、《麦拉赫》、《米斯巴哈》、《阿瓦米里》、《遭五》，以及赞主赞圣诗词《卯鲁德》、《麦达伊哈》、《穆斯太哈斯》、《番太海耶》等。这些作品部分可能还在民间流传，但由于没有整理，目前不为人所知。

① “小经”文字，是我国回族创造的一种拼写汉语的文字，是中国最早的汉语拼音，自清朝以来为各地穆斯林广为使用。回族的“小经”，拼写出的实际是汉语。因此，回族的小经文字实际属于汉语的范畴。“小经”一般由 36 个字母组成（包括 28 个阿拉伯字母，4 个波斯字母和 2 个维吾尔字母和 2 个自创字母）。其具体组成字母如下所示：

ي و ه ن م ل ء ك ق ف غ غ ط ط ض ص ش س ز ر ذ د ج ح ج ب ث ت ا (其中 ك ز ج ب 为波斯字母，غ ط 为自创字母，س ز 为维吾尔字母，其它字母为各语言公用)。但是，阿拉伯语的个别字母在“小经”中很少用，阿拉伯语个别字母，在“小经”中的发音也稍有不同。

② 据马谨老先生说，他依稀听老人说，他祖上是避难来到洮州的。笔者推断，马谨先生可能小时候只听见“逃难”，没有在意谁避难到了哪里；他祖上来洮州不应是逃难来的，而是如同目前临潭回族所说的他们的祖先是戍边从南京迁徙而来的，因为逃难不会逃到临潭这样偏远而闭塞的地方。马谨先生所说的避难，应该是马福禄阿訇携全家逃难，流落兰州，因他年轻时刚好遇上清同治二至五年临潭回族的起义，可能为了避难，他携带全家逃出临潭的。据马谨老先生说，马福禄的父亲是一个盲人。据此来看，把一个行动不便的父亲带到兰州，很可能就是逃难，一般的求学不会带一个盲人父亲。因此，马福禄阿訇离开临潭的时间，大概在同治二至五年间。

③ 见《天方尊大真经中华明文注解》前言。

（二）翻译《古兰经》的经过

据沙忠阿訇在《天方尊大真经中华明文注解》的后记中记述，他在30年前（约1880年）就举意翻译《古兰经》，因为在“中华地方没有合乎本地语言的‘凯塔布’（经典，指《古兰经》汉译本）”。他曾问过他的老师马世忠，“波斯和土耳其都有自己的语言的《古兰经》译本，中国为何就没有呢？”^①老师说“如今的时代（可能指清末回民起义时期），我们的教门（伊斯兰）在中国不能兴活，以后若真主意欲，教门会兴活，那时会有经典的”。^②过了30年，清王朝气数将尽，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展开，受新文化运动的启迪，中国穆斯林也开始觉醒，在文化上有了新的要求。沙忠阿訇他们感觉到历史的使命落到他们这一代人的肩上，而且时代较以前宽松了，^③该到翻译经典的时候了。于是他筹划翻译《古兰经》，恰值他的“知己朋友伊卜拉黑默”也有这种想法，“二人没有任何先前的约定就走在了同一条道路上”。^④清宣统元年（1909年）的斋月，他们开始了翻译工作。在翻译过程中，他们除了借助自己高深的阿拉伯语功底和雄厚的《古兰经》知识外，没有任何一种《古兰经》的译本供他们参考。但有一个人对他们起了一定的作用，据《天方尊大真经中华明文注解》前言介绍，“然后，真主使他二人顺利开始了翻译尊大《古兰经》的工作，在博学多才的著名学者（此处有一个小注，写“达悟德”）的教授下完成了”。这位博学的达悟德阿訇家住兰州南稍门，不知是否就是沙忠阿訇的老师马世忠，无从考证。但在前言和后记中提到的译者始终是两位，而不是三位，并且译本封面上署名的译者是“沙奥拜顿拉和马伊卜拉黑默”，即沙忠和马福祿。据此推断，真正的译者就是两位：沙忠和马福祿，而达悟德阿訇只不过是他们在他们遇到难译的地方去求助的人。翻译工作于宣统三年斋月的第三个主麻日完成，历时三年。完成时，已经到了中华民国元年。据前言介绍，他们把译本分成了六册，因为在他们翻译《古兰经》前遇到了六个吉祥的征兆，“合乎那六个奥妙者把注释匀成了六册”。翻译工作完成后，他们一人抄写《古兰经》明文，一人誊写小经翻译，共同完成了《天方尊大真经中华明文注解》的翻译和抄写，然后在经堂中传阅。但据沙忠阿訇后裔沙虎阿訇介绍，他们先后抄写了三个版本，即最初的六卷本，以及后来的一卷本和三十卷本。^⑤1992年，沙虎阿訇等人将六卷本的版本合订成三册，在甘肃广河翻印，在兰州和临夏等地经堂中流传。

（三）翻译特点

作为中国第一部《古兰经》汉语翻译，在没有参考任何译本的情况下，马福祿和沙忠阿訇完成《天方尊大真经中华明文注解》的翻译，实属不易。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本译本有较大的局限性和缺陷。本译本有三大特点“小经”文字翻译、兰州方言、经堂语。这三大特点既是它的特色，又是它的局限性。然而，这并不影响它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

1. “小经”文字翻译

“小经”文字，是我国回族创造的一种拼音文字，是中国最早的汉语拼音。它采用阿拉伯语、波斯语和维吾尔语字母来拼写各地穆斯林的方言，包括拼写东乡、保安、撒拉等少数民族的语言。中国的回族由于操汉语，用“小经”拼写出的语言是汉语，因此，回族的小经文字实际属于汉语的范畴。自清朝以来，“小经”为各地穆斯林广为使用，不懂中文的回族人记账、写信、打便条、翻译经典都使用“小经”文字。“小经”在有些地方称“小儿经”，或叫“小儿

①② 《天方尊大真经中华明文注解》后记。

③④ 那时马安良为甘肃都督，甘肃穆斯林认为自己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有了较大的提升，回族社会趋于稳定，人身安全有了一定的保障。

⑤ 一卷本的不知下落，六卷本的在临夏博物馆存有一套，而三十卷本的被沙虎阿訇自己于2000年赴麦加朝觐时转让给了沙特穆斯林朋友。

锦”，也有人解释为“消经”或“晓经”。但在河湟地区（临夏、青海、兰州一带）都普遍叫“小经”，甚至清朝时期的文献中用阿拉伯语把“小经”翻译成“小小的经”，说明这一名称中包含着两个概念“小”和“经典”。“小经”是相对“大经”而言的，“大经”是指经堂大学中讲论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经典，而“小经”则是经堂小学中用外语字母拼写的汉语，只要熟悉外语字母，就可以读懂其中的汉语意思，因而有“小儿经”之称。马福禄和沙忠阿訇在翻译过程中采用的就是回族惯用的“小经”，实际就是用“小经文字”拼写的汉语。因此，《天方尊大真经中华明文注解》就是一部汉语的《古兰经》译本。另外，中国穆斯林用“小经”字母拼写汉语，是伊斯兰文化中国化或本土化的重大尝试，是对汉文化认可的重要步骤。

2. 浓重的兰州方言

兰州方言是汉语北方方言中兰银官话的一种，其特点是对个别字母的发音不同于其它北方方言。例如“sh”在兰州方言中发“f”的音，因此，“水”读“费”，“说”读“弗”，“顺”读“丰”；“r”有时读“w”的音，因此，“如像”就读“吾像”，“出入”读“出吾”。这些特征在《天方尊大真经中华明文注解》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以翻译《古兰经》第2章第8节明文为例：“与从一切人中有那个人，他弗（说：‘我们归丰（顺）了真主，与归丰（顺）了后世的日子，与他们一定不是穆民着’”。本章第11节经文的翻译更加体现了兰州方言的特色，“与沃是（若是）人给他们弗（说）了，你们在地面里边不了（即不要）干坏事的时候，他们弗（说）了，我们只是屈理的人”。

以上两段译文中，“sh”和“r”的发音完全符合兰州方言的习惯，两节经文的翻译，充分体现了兰州方言的特色。兰州方言是至今仍然在兰州地区广泛使用的方言，上百年前的口音今天依然流行。因此，对熟悉兰州方言的人来说，阅读和理解《天方尊大真经中华明文注解》非常容易。

3. 经堂语

经堂语是我国穆斯林学者在经堂翻译经典或演讲时所使用的融汉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为一体的混合语言。它基本从属汉语语法的范畴，多用于口头，而且在翻译上严格遵守直译和逐字逐句翻译的原则。这种语言由于一般在经堂讲经和清真寺的演讲时使用而被称作“经堂语”。经堂语核心分两部分，一为经堂词汇，二为经堂语气；前者在于使用独特的词汇，后者在于应用特殊的技巧。经堂语的词汇，以汉语为主，兼收了大量阿拉伯语及波斯语的词汇。其汉语词汇多来自古代汉语和明清时期的白话文，还有许多由个别经师根据自己的理解“自拟自造”的词组。实际上，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以前，穆斯林的学术界一直通用白话文——经堂语，《天方尊大真经中华明文注解》就是穆斯林白话文的典范。例如，《天方尊大真经中华明文注解》对《古兰经》第2章1-5节是这样翻译的：

“指着艾立夫、俩目、米目着发愿，那个是在它里边无设疑着的正经，引领计较的（人），未见着他们归顺（丰）了的那一切人，与他们立站‘乃麻子’。与从那个上，我给他们衣禄给的那个上他们费用哩。与他们是那一切人，他们归顺（丰）那个，人下降在你上的那个，与人从你之前下降了的那个。与他们是他们定信了后世，此一夥人是从调养他们的主上的，常守正道的。此一夥人，他们是得脱离的一切人。”

这段译文中，有经堂语的几个特征：逐字逐句的翻译，“与”是阿拉伯语中的连词，可以不译，但经堂语不放过任何一个词，于是在短短的几句译文中多次出现了“与”字。“着”是经堂语的一个语气词，多次应用。“乃麻子”是波斯语，经堂就直接音译。另外，经堂语的另一大特点是，语序基本与阿拉伯语的原文对应，导致许多地方不符合汉语的习惯，显得累赘、蹩脚。以上特点在这段译文中很突出，一读就知道它是经堂语。然而，经堂语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在中国伊斯兰学术界很成熟，也很规范，无论各地的方言有多大的差异，发音有多大的不同，经堂语的

关键语气和基本词汇在我国南北都是一致的。因此,《天方尊大真经中华明文注解》尽管带有浓重的兰州方言,而且是用经堂语译成,但南北的经师一读就明白。现将这段译文跟80多年后河北马振武阿訇完成于1994年的经堂语译文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二者风格上的一致。马振武阿訇对这段经文是这样翻译的:

艾立府、俩目、米目,那个是“克它布”。在它里边没有设疑着,是引领那一些“闷台给尼”的。他们归信“艾不”,与他们立站“乃麻子”,与他们就从我慈悯他们的那个上使费,与那些人,他们归信人把它降至你的那个,与人在你之前降它的那个,他们就定信后世。此一些人,是在调养他们的主的正道上,此一些人,就是一些得成功的。^①

比较两端译文,风格一致,即语序符合阿拉伯语原文语序,不符合汉语习惯;直接音译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多次使用连词“与”字和“那个”;有几个词汇是经堂语约定俗成的,没有变化,如“设疑”、“归信”或“归顺”、“立站”、“调养”、“此一夥人”或“此一些人”。两种译文的时间跨度尽管有80多年,地理上从西北跨到华北,但共同的经堂语使得两个译本高度接近,这就体现了经堂语的规范性。

三、版本的意义和价值

《天方尊大真经中华明文注解》作为第一部汉语《古兰经》通译本,其意义和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历史价值:它是第一部《古兰经》汉语通译本

《古兰经》的翻译工作,在国外起步很早。据研究,世界上最早的《古兰经》译本于公元1141年至1147年间在欧洲的法国完成。当时部分传教士为配合十字军东征的计划,开展了一系列对东方世界的研究,其中包括对《古兰经》的研究,旨在为他们的军事行动提供理论依据,此译本有歪曲、丑化和敌视伊斯兰的倾向。但该译本过了400年,于16世纪中叶才在瑞士的巴塞尔刊印发行。^②16世纪以后,西欧各国用大语种陆续译出《古兰经》,尽管多出于“反驳”的目的,但表面上呈现出繁荣的景象。^③在中国,较大规模的《古兰经》翻译,应始于19世纪中叶。最早按章节顺序尝试翻译《古兰经》的是,我国云南经堂大师马复初和他的弟子马安礼。约在19世纪60年代,他们共同进行了《宝命真经直解》的翻译工作,开了中国翻译《古兰经》的先河。然而,这部巨著只完成了《古兰经》的20卷,即三分之二,而其中15卷又在战火中遗失,现存5卷。因此,此译本只是残本,算不上《古兰经》的通译本。而《天方尊大真经中华明文注解》完成于1912年,且是通译本,比铁铮的《可兰经》早15年,因而是中国第一部通译本。据译者在后记中交代,他们在翻译《古兰经》时,“中华地方没有合乎本地语言的‘凯塔布’(经典,指《古兰经》汉译本)”。占据这一历史位置,本身就是《天方尊大真经中华明文注解》的价值所在。

2. 语言学价值:它是研究明清时期西北方言的活化石

“小经”文字是一种表音文字,它不但准确地标出各种语言的读音,就连各方言的细部特征也能表达出来。《天方尊大真经中华明文注解》是按照兰州方言翻译过来的,带有非常明显的“兰州话”的特征。随着我国国民教育的发展,以及普通话的推广,“兰州话”受到了普通话的影响,甚至是威胁,目前已经极难听到纯真的“兰州话”了。而《天方尊大真经中华明文注解》却完整地保留了纯真的“兰州话”,至少是明清时期的兰州方言。它展示了“兰州话”的一些表

① 林松 《古兰经在中国》,第227-228页。

②③ 同上,第6页。

达习惯、发音规律、用词方法，是研究 19 世纪兰州方言的“活化石”。“兰州话”是汉语北方方言中兰银官话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天方尊大真经中华明文注解》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对了解西北汉语的发展和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对研究整个汉语的发展也有一定的价值。

3. 文化价值：研究伊斯兰文化本土化的重要资料

经堂语是中国经堂教育的产物，更是伊斯兰文化中国化的产物。它是中国穆斯林学者为翻译阿拉伯文、波斯文经典而创造出来的语言体系。经堂语以汉语为主，兼收了大量阿拉伯语及波斯语的词汇，其汉语词汇多来自古代汉语和明清时期的白话文。《天方尊大真经中华明文注解》所用的语言，正是融汉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为一体语言，既有元明时期的语言风格，又有清朝以来现代汉语的特征，可以说是展示语言文化的“大观园”。经堂语兴起于明代，到清末到达了鼎盛，即语言规则和表达技巧达到了娴熟和高超的程度。从现有经堂语资料来看，19 世纪的经堂语跟 20 世纪 80 年代的经堂语没有多大区别，说明至少到 19 世纪中叶，经堂语已经趋于成熟。而那时的经堂语就主要借用了当时流行的汉语，包括中国儒释道的一些术语，以表达伊斯兰文化的一些理念。因此，对《天方尊大真经中华明文注解》的研究，必将对伊斯兰文化本土化的认识起重要的作用。

四、结 语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丰富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点缀着华夏文明的风采。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实际就是对汉文化研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在我国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中，缺少了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实际就是汉文化研究中的一大缺失。《天方尊大真经中华明文注解》虽然是回族伊斯兰文化中的一部分，但应在华夏文明的层面进行研究，并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它对汉语言文化的研究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对了解中国伊斯兰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另外，中国穆斯林用“小经”字母拼写汉语，是伊斯兰文化中国化或本土化的重大尝试，是对汉文化认可的重要步骤，同时，也是中国穆斯林对汉文化产生向心力的一个标志。

（责任编辑：李建欣）